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6年第5期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第25卷) (SOCIAL SCIENCE EDITION)

就业帮扶政策赋能农户增收的效应与机制

杨雨萱,黄思琳,张开云

(华南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2)

摘 要: 提高农户收入是推进共同富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核心目标,然而学界关于就业帮扶政策的收入效应依然存在争论。基于此,通过2020年"农村居民家庭生计状况与减贫政策调查"数据,实证分析就业帮扶政策对农户非转移性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就业帮扶政策对农户非转移性收入具有正向提升作用,其影响机制在于就业帮扶政策可以有效提升家庭劳动供给能力和促进家庭劳动供给行为。异质性分析表明,就业帮扶政策对建档立卡户及社会资本水平较低农户的非转移性收入提升效应更为突出。研究为优化就业帮扶政策的精准施策方向、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了实践参考。

关键词: 就业帮扶政策;农户收入;非转移性收入;家庭劳动供给;共同富裕

中图分类号: F323.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202(2026)05-0111-15

一、引言

中国农村贫困治理历经从生存型救济向发展型赋能的转型,深刻映射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逻辑。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保障机会公平,坚持突出抓好重点群体就业,确保人人都有通过勤奋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这一战略部署实质性地将农民内生发展能力的培育纳入了乡村振兴的制度框架,进一步彰显了就业帮扶政策在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推动包容性增长中的关键效能。因此,在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推进过程中,促进就业帮扶政策的制度性重构与范式转型、推动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已成为就业工作的新定位和新使命[1]。

作为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衔接进程中的核心制度安排,中国就业帮扶政策体系历经三十余年的探索与演进,完成了从初期的粗放式安置、临时性救济,向如今的精准化施策、长效化赋能的结构性跃升。在这一制度演化逻辑的背后,收入始终是衡量政策成效的核心标尺[2]。它不仅是增强广大农户家庭生计韧性的基础前提,更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激活农村内生消费与发展动能的根本路径[3]。随着政策体系的持续完善,就业帮扶已成为推动农村家庭持续增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关键力量,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收入根基。

学术界关于就业帮扶政策对农户的增收效应仍存在分歧,围绕政策工具的实效性主要形成了两类观点。一方面,部分研究认为,就业帮扶政策面临着复杂的制度摩擦与市场失灵问题。在微观层面,长期干预易诱发农户的"福利依赖",导致短期的收入提升随着政策退出而迅速衰减[4];在宏观层面,行政主导难以从根本上弥补市场就业机会短缺与经济波动[5]。此外,公共就业服务机

收稿日期: 2025-11-10 **DOI:** 10.7671/j.issn.1672-0202.2026.05.009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22JZD02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2074083)

作者简介: 杨雨萱(1994—),女,河南驻马店人,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政策。E-mail:yangyuxuanxuan1994@163.com

通讯作者: 张开云(1973—),男,江西丰城人,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乡社会治理与乡村振兴。E-mail:731212678@vip.sina.com

构受制于职能交叉与服务碎片化，加之基层岗位供需匹配效率低下[6]、信息不对称与机会主义倾向[7-8]，严重削弱了政策实效。劳动者也因预期收益不明朗、培训内容脱离产业实际等原因缺乏参与积极性[9-10]，导致政策难以成为持续增收的稳定引擎。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另一部分学者基于深入的学理阐释与实证检验，肯定了就业帮扶政策对收入增长的长期正向效应。相关研究紧密结合能力贫困理论、可行能力理论等深入阐释就业帮扶政策通过打破多维能力贫困陷阱、拓展农户可行能力集，进而实现收入跃升的内在机理[11-12]。大量实证研究证实二者呈显著的正相关[13-14]。不同于短期的现金转移支付，着眼于长期能力建设的帮扶能够激发农户内生动力，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与资源配置效率[15]。具体增收路径包括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与迭代[16]、拓展社交网络与资本储备[17]、缓解信贷约束[18]等。同时，就业帮扶政策有效推动了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19]、提升了整体劳动参与率[20-21]，并激活了创业动能。部分研究还指出，政策在农村常住人口、老一代农民工以及本地就业群体中边际增收效果尤为突出[21-22]。

综上可见，当前关于就业帮扶政策增收效应的探讨虽成果丰硕，但尚未达成共识，且在深层作用机制与政策干预的群体异质性方面仍具有理论拓展空间。作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深入探究该政策对农户增收的实际作用、厘清效应边界与关键因素，对于优化资源配置、精准调整政策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

基于此，本研究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将就业帮扶政策效果评价从宽泛的总体收入增长，聚焦于更能体现内生发展能力的“非转移性收入”维度，并综合运用倾向值匹配、双重机器学习等计量方法，稳健地证实了就业帮扶政策对农户收入的显著正向影响；二是解构出家庭劳动供给能力与行为两大可测维度，厘清了就业帮扶政策通过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优化劳动力市场参与行为，进而实现农户收入增长的深层机制；三是深入考察就业帮扶政策对不同经济水平、社会资本存量水平农户的异质性影响，为未来优化就业帮扶政策资源的差异化配置、提升政策设计的精准度提供了微观经验证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就业帮扶政策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基于国家政策导向与学术研究共识，可将就业帮扶政策划分为技能提升类及创业与合作支持类两大维度。当前，我国就业帮扶体系正逐步从单一技能培训向创业扶持与合作赋能延伸：在国家政策层面，《“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国发〔2021〕14号）将技能提升与创业带动纳入就业促进的核心框架，提出“及时提供就业技能培训支持”，并强调“落实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政策支持创业企业发展”[23]；《关于切实加强就业帮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人社部发〔2021〕26号）则进一步加速了两类政策的落地：第八条具体部署“鼓励发展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第十条要求“落实税费减免、创业担保贷款及一次性创业补贴等支持”，第十四条着重强调“实施欠发达地区劳动力职业技能提升工程”[24]。地方层面的政策实践同样印证了这一逻辑：平川区在相关解读中明确将技能培训、担保贷款、创业促进等举措纳入就业帮扶核心内容[25]；九江市则将合作社与家庭农场吸纳就业设为政策扶持的硬性量化指标[26]。纵观上述政策演进历程，技能培训体系的构建、创业与合作支持机制的完善，已共同构筑起新时期就业帮扶政策体系的核心框架，二者内在耦合、功能互补。

与此同时，学界关于就业帮扶政策的研究已逐渐形成了将“创业与合作支持”纳入核心维度的理论共识。在理论阐释层面，学者基于可持续生计、新内生发展理论等指出，农户对接现代大市场时普遍面临交易成本高与抗风险能力弱的结构性短板。将家庭农场与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

体作为关键政策工具，通过组织化网络将分散的农户重新嵌入产业链条，是完善就业帮扶制度、推进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27-28]。在实证检验层面，研究证实了这类工具的“就业－增收”双重效应：直接效应表现为新型经营主体通过提供岗位，有效带动农业劳动力本地化就业[29]；间接效应则体现为经营主体的资本与技术替代释放了家庭冗余劳动力，并依托其社会化服务拓展了农户的非农增收空间[30]。综上，将“技能提升”与“创业与合作支持”并列为就业帮扶政策的两大核心维度，已具备坚实的学理基础与实证支撑。

基于 Sen 的可行能力理论，农户增收的本质是可行能力集的拓展，就业帮扶政策通过破解能力剥夺实现增收赋能[12]。当前农村就业结构正加速向多元化、技能化转型[31]，但农户仍面临信息与要素配置的能力约束。就业帮扶政策主要通过以下逻辑拓展其非转移性收入：首先，技能提升类政策通过多维度赋能人力资本拓宽增收渠道。技能培训突破劳动力市场分割，提高劳动效率与岗位适配性，增强职业转换能力，帮助农户获取工资溢价[32]；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助其突破小农生产局限，提升农产品附加值，非农技能培训则赋能农户把握市场需求，规范扩大经营规模，从而提质经营性收入；农户技能提升增强其资产配置与增值能力，提高资产收益转化率，催生资本性收入[33]。其次，基于内生增长理论，创业与合作支持类政策通过组织与产业协同激活持续增收动能[34]。创业支持拓宽了本地就业容量，合作社与家庭农场规模化经营吸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长期或季节性的工资收益，反哺工资性收入；组织化协同破解小农户购销难、议价弱等痛点，通过信息资源共享拓展经营边界，壮大经营性收入；政策支持创业项目转化为可增值资产，并通过合作社资产量化、盈余返还与按份分红等利益联结机制，使农户分享产业链资本红利，拓宽资本性收入渠道[35]。据此提出研究假说 H1：

H1：就业帮扶政策对农户非转移性收入水平具有提升作用。

（二）就业帮扶政策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机制

1. *家庭劳动供给能力*

基于 Schultz 的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的持续积累是驱动微观个体收入跃升的核心变量[36]。就业帮扶政策主要通过直接的技能强化与间接的技能传递双重路径，重塑农户家庭的劳动供给能力。一方面，政策干预（如职业技能培训）能直接赋能现有劳动力，促使农户家庭劳动供给由体力密集型向技能密集型结构跃迁。这不仅显著提升了农户劳动的边际产出价值[37]，更助其突破传统农业就业的低端锁定，获取更高溢价的多元化收入。另一方面，就业帮扶政策间接促进人力资本在农户家庭内部的代际传递与持续积累。由于劳动技能具有可传递性和可积累性[38]，农户家庭中率先掌握技能的成员，可通过对其他家庭成员的技能传授，提升家庭整体劳动供给能力。同时，家庭成员可在基础技能上持续参与进阶培训，不断提升技能水平以匹配更高薪酬的工作岗位，实现农户家庭劳动供给能力的持续提升与收入的长期增长。据此提出研究假说 H2：

H2：就业帮扶政策通过提高农户家庭劳动供给能力，从而增加其非转移性收入。

2. *家庭劳动供给行为*

经典劳动供给理论指出，市场参与决策根本上取决于预期收益与机会成本的权衡[39]。长期以来，农户受预期收益低下[40]、参与成本高昂的双重约束[41]，陷入劳动供给不足的困境。就业帮扶政策通过介入干预，有效激活农户劳动供给从而实现增收。一方面，技能提升类政策通过人岗匹配与专业赋能提高农户预期工资率。特别是针对缺乏信息或技能的隐性闲置劳动力[42]，政策通过培训与岗位对接等方式，将其直接转化为实际劳动参与者，使新增的家庭劳动供给快速转化为家庭收入[43]。另一方面，创业与合作支持政策有效降低了农户参与市场的交易成本。通过提供技术咨询与供需对接服务降低信息壁垒，并借助信贷支持缓解资本约束与创业的生存性风险，使农户敢于承担市场风险，积极参与劳动力市场，进而拓宽增收渠道。据此提出研究假说 H3：

H3:就业帮扶政策通过促进农户家庭劳动供给,增加其非转移性收入。

(三)就业帮扶政策对农户收入影响的群体异质性

1. 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作为重要的非正式资源,深刻影响个体对公共政策的获取与转化效率,导致就业帮扶政策的收入效应产生结构性分化[44]。在乡村场域中,其非均衡分布造成了农户在政策认知及利用能力上的巨大差异[45]。首先,在政策获取的初始环节,社会网络异质性导致了农户间的信息鸿沟[46]。高社会资本农户凭借强关系网络,以低成本提前获取高效的政策信息;低社会资本农户则高度依赖滞后的公开渠道,易因信息摩擦错失政策红利。其次,在资源向收益转化的终端环节,社会资本发挥着关键性催化作用[47]。高社会资本农户获政策赋能后,可依托网络信任机制迅速对接岗位与资金,高效实现经济变现;低社会资本农户则受制于网络闭塞,面临资源转化壁垒,即便获同等支持,也常因缺乏"牵线搭桥"而陷入资源闲置,致使政策的实际增收效能大打折扣。据此提出研究假说 H4:

H4:就业帮扶政策对高社会资本农户的增收效应更大。

2. 家庭经济状况

建档立卡确立了贫困户与非贫困户的身份标签,本质上映射了农户资源禀赋上的结构性鸿沟[13],其脆弱性特征深刻调节着农户对就业帮扶政策的吸收与转化能力。一方面,从边际效益视角看,政策的边际增收效应与初始禀赋呈负相关。贫困户普遍面临经济、社交与技能等多重约束,资源存量低[48]。技能培训、贷款担保等政策能精准填补其紧迫的缺口,释放出较高的边际经济效应。而非贫困户已具备相对完善的生计资本体系,同质化政策的边际补充作用有限,易产生资源冗余[49]。另一方面,从心理-行为机制的路径来看,长期窘迫易使贫困户陷入自我效能感低下、风险厌恶强烈的习得性无助困境[50]。就业帮扶不仅是物质赋能,更是重塑生活秩序的心理干预[51]。这种从"外部输血"到"内部造血"的机制,能有效唤醒其内生动力,促使其将政策资源转化为实际收入。据此提出研究假说 H5:

H5:就业帮扶政策对贫困农户的增收效应更大。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团队 2020 年开展的"农村居民家庭生计状况与减贫政策调查",覆盖广东、贵州、江西三省。调研共发放问卷 1500 份,实际回收问卷 1353 份,问卷回收率为 90.2%。经剔除关键变量严重缺失及逻辑错误问卷后,最终保留有效样本 1059 份。

(二)变量设置

1. 因变量:农户非转移性收入。参考国家统计局相关标准以及结合问卷实际,本文将其界定为农业收入、劳务工资收入及经商资本收入。研究未纳入转移性收入,主要基于以下考量:其一,既有研究已证实,就业帮扶政策对其提升作用并不显著[52]。其二,非转移性收入的分类与本文划分的两类帮扶政策(技能提升类、创业与合作支持类)具有高度的逻辑适配性与映射关系:技能提升类政策预期主要作用于劳务工资收入和经商资本收入,而创业与合作支持类政策的效果则应显著体现于经商资本收入、劳务工资收入及农业收入的变化。在数据处理上,三项收入的缺失多源于农户客观上未从事相关活动。为避免直接剔除引发样本损失与选择偏差,本文将缺失值统一编码为 0 并加总计算。同时,在分析过程中对该因变量作了取对数处理。

2. 自变量:农户就业帮扶政策。本文将其划分为"技能提升类"(含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培训、农业生产经营技术服务政策)及"创业与合作支持类"(含返乡创业支

持、合作社组建、家庭农场政策发展、贷款担保）两大维度。本指标体系采用广义的主动劳动力市场政策视角[53]。在中国乡村半工半耕的模式下[54]，农户的自我雇佣与雇佣劳动高度交织[55]。“农业技术服务”实质为本土化职业培训；“合作社”与“家庭农场”则是吸纳就业的组织化载体。统筹纳入能精准捕捉中国特色政策协同增收的真实路径[56-57]。在测量上，各项政策按参与度赋值 0～5 分（依次为：未参与，参与度很低，参与度低，参与度一般，参与度高，参与度很高），得分加总即为总体参与度，以衡量帮扶政策的实施强度与累积效应。

3. 控制变量：包括社区、家庭与个体层面的相关特征，旨在控制影响政策参与决策与家庭收入的潜在混淆因素。具体包括：所在行政村离县城的距离；慢性病人口占家庭总人口的比重（慢性病人口数/家庭总人口）；家庭经营土地面积（耕地、菜地、果林等面积总和，取对数）；行政村人均收入（按实际情况测得，取对数）；家庭过去一年自付医疗费用（按实际情况测得，取对数）；参加医疗保险人数占家庭总人口的比重（参保人数/家庭总人口）；是否购买农业保险（是 =1，否 =0）；家族关系（从很差到很好，依次赋值 1～5）；受访者受教育年限（未上学 =0，小学 =6，初中 =9，高中或中专 =12，大专 =15，本科 =16，硕士 =19，博士 =23）；过去三年家中是否有人失业（是 =1，否 =0）。

4. 机制变量：本文的机制变量包括家庭劳动供给能力和家庭劳动供给行为。家庭劳动供给能力，本文选取“家庭技能劳动力占比”作为代理变量。劳动供给能力不仅取决于劳动力数量，更取决于其质量与市场竞争力。技能劳动力占比越高，表明该家庭拥有更高的人力资本存量与就业潜能，具备更强的市场适应性。家庭劳动供给行为，本文选取“家庭劳动参与率”进行测度。劳动参与率体现了农户将潜在劳动力转化为实际就业的程度，直观反映了家庭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实际参与意愿与行动强度。

5. 调节变量：本文的调节变量包括是否建档立卡和社会资本。其中是否曾经是建档立卡户，是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对于社会资本的测量，主要参考周广肃、樊纲[58]及赵昕、蒋文莉[59]等人的做法，使用“人情支出”，即家庭当年送出的礼金和礼物（折合为人民币）作为其拥有社会资本数量的代理变量。在具体分析中，按照均值进行分组，大于均值视为高社会资本，小于均值视为低社会资本。

所有统计分析均使用 STATA 软件 18.0 版进行，运用 OLS 模型、倾向值匹配及双重机器学习方法来分析就业帮扶政策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所有模型均使用稳健标准误差。

（三）模型构建

为考察就业帮扶政策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本文构建模型（OLS）如下：

$$Fam_income_i = \alpha_0 + \alpha_1 Jiuye_i + \alpha_2 X_i + \partial_i \quad (1)$$

其中，Fam_income_i 为家庭 i 的家庭年非转移性收入；$Jiuye_i$ 为就业帮扶政策的参与度，使用各类就业帮扶政策的参与度进行加总；X_i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个人层面、家庭层面、社区层面以及城市固定效应；∂_i 为随机误差项。本文使用稳健标准误差。

另外，本文进一步考虑倾向值匹配以及双重机器学习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首先，考虑到研究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应用了倾向值匹配模型。由于解释变量与结果变量之间往往会受到众多混杂变量的影响，因此很难直接观察到解释变量对结果变量的纯粹效应。为了克服这种问题，倾向值匹配方法通过使用 Logit 模型预测出个体的倾向值，并通过控制这一倾向值来减轻选择性偏差对因果推论的干扰。传统回归在处理高维变量时易陷入“维度诅咒”、多重共线性及非线性模型误设等困境。双重机器学习模型借助机器学习及其正则化算法，既避免了变量冗余或缺失导致的估计偏差，又能高效处理非线性关系，从而获得比传统计量模型更准确、稳健的估计结果。

鉴于传统中介效应“三步法”饱受质疑，本文采用“两步法”[60]。具体来看，在研究解释变量 X 对被解释变量 Y 的作用关系中，要引入机制变量 M 时，应先检验 X 对 M 的影响，称为机制检验的

第一阶段,以说明引入机制变量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然后,关于机制变量 M 对被解释变量 Y 的影响,将其称为机制检验的第二阶段,由于引入新的解释变量 M 可能会导致额外的内生性问题,因此可以借助已有研究说明机制变量 M 对 Y 是有影响的,这样就无须进行机制检验的第二阶段,只要验证机制检验的第一阶段即可[61-62]。此外,本文使用了分组回归进一步检验机制分析的稳健性。

(四)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下(表1)。具体而言,家庭非转移性收入的均值约为13.3万元;就业参与度的均值约为11.46;在人口特征方面,样本人群中慢性病人占家庭总人口的比重均值约为17%;样本人群家庭经营土地面积约为55.6亩;约24%的样本人群购买了农业保险。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家庭非转移性收入(万元)	1059	13.30	48.10	0.00	1260.00
就业政策参与度	1059	11.46	6.99	0.00	35.00
所在行政村离县城的距离	1059	31.40	32.84	0.00	488.00
慢性病人占家庭总人口的比重	1059	0.17	0.26	0.00	1.00
家庭经营土地面积	1059	55.60	43.11	0.00	283.00
行政村人均收入(万元)	1059	1.68	2.22	0.00	34.00
家庭去年自付医疗费用(万元)	1059	0.42	1.40	0.00	38.00
参加医疗保险人数占家庭总人口的比重	1059	0.93	0.21	0.00	1.00
是否购买农业保险	1059	0.24	0.43	0.00	1.00
家族关系	1059	3.70	0.79	1.00	5.00
受访者受教育年限	1059	8.99	4.23	0.00	19.00
过去三年,家中是否有人失业	1059	0.70	0.25	0.00	1.00

四、结果分析

(一)就业帮扶政策对农户非转移性收入的影响

表2报告了就业帮扶政策对农户非转移性收入影响效应的估计结果,第(1)列没有加入控制变量,第(2)列加入了部分控制变量,第(3)列加入了全部控制变量。从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就业帮扶政策参与度的系数始终为正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这说明随着农户就业帮扶政策参与度的提高,其家庭年非转移性收入也随之增加。具体来看,在加入所有控制变量之后,就业帮扶政策参与度每提高一个单位,家庭非转移性收入的对数上升0.047。

表2 就业帮扶政策对农户非转移性收入的影响效应

变量	农户非转移性收入(取对数) (1)	农户非转移性收入(取对数) (2)	农户非转移性收入(取对数) (3)
就业帮扶政策参与度	0.074***(0.012)	0.070***(0.012)	0.047***(0.014)
所在行政村离县城的距离		-0.011***(0.003)	-0.009***(0.003)
慢性病人口占家庭总人口的比重		-4.769***(0.512)	-4.162***(0.488)
家庭经营土地面积(取对数)		0.250***(0.075)	0.327***(0.071)
行政村人均收入(取对数)		-0.079(0.069)	0.063(0.080)
家庭去年自付医疗费用(取对数)			0.336***(0.058)
参加医疗保险人数占家庭总人口的比重			0.754(0.527)
是否购买农业保险			0.776***(0.229)
家族关系			0.329***(0.125)
受访者受教育年限			0.148***(0.025)

续表

变量	农户非转移性收入（取对数）（1）	农户非转移性收入（取对数）（2）	农户非转移性收入（取对数）（3）
过去三年，家中是否有人失业			-0.391(0.417)
城市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常数项	9.115***(0.217)	10.162***(0.681)	1.276(1.253)
Pseudo R^2	0.02	0.16	0.36
N	1059	1059	1059

注：***、**和*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农户非转移性收入进行了自然对数处理，下文各模型均保持一致。

（二）稳健性检验

1. 重复抽样

为验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研究采用 Bootstrap 方法进行稳健性分析。本研究在引入控制变量与城市固定效应的基础上，对全样本分别重复抽样 500 次、1000 次与 2000 次的结果显示，就业帮扶政策参与度的回归系数稳定在 0.047，且均在 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进一步抽取 90%的子样本进行 1000 次重复抽样，其回归系数为 0.059，同样在 1%的水平下显著正相关。上述多重模拟样本下的一致性结果表明，就业帮扶政策对农户非转移性收入的促进作用并非偶然，从非参数检验视角确证了基准回归结论的高度稳健性。

2. 双重机器学习

本研究基于双重机器学习构建了部分线性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估计了就业帮扶政策参与度对家庭非转移性收入的影响。在控制全部协变量与城市固定效应的前提下，按 1∶4 的比例分割样本，并分别采用随机森林、套索回归以及神经网络三种机器学习算法进行预测求解。结果显示，在随机森林、套索回归和神经网络算法下，就业帮扶政策参与度对农户非转移性收入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041、0.045 与 0.051，且均在 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表明在采用机器学习算法更灵活地控制混淆因素干扰后，就业帮扶政策对农户非转移性收入的显著正向影响依然成立，进一步印证了前文基准回归结论的稳健性。

（三）内生性分析

1. 倾向值估计结果

考虑到研究中可能存在的样本选择性问题，进一步用倾向值匹配进行结果的验证。在进行倾向值匹配时，按照自变量样本均值将该变量划分为高、低两组，并进一步构造为 0－1 虚拟变量。表 3 为倾向值匹配结果，其中模型（1）使用的是核匹配；模型（2）使用的是 k 近邻匹配，其中 $k=5$；模型（3）使用的是卡尺内的近邻匹配，其中卡尺的范围是 0.05。通过不同匹配方式进行匹配之后，ATT 值显著为正，再次表明就业帮扶政策参与度对家庭非转移性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表 3　倾向值匹配结果

变量	农户非转移性收入		
	核匹配（1）	近邻匹配（2）	卡尺内的近邻匹配（3）
就业帮扶政策参与度（ATT）	0.754**(0.331)	0.660*(0.338)	0.665**(0.338)

2. 平衡性检验

平衡性检验表明，所用匹配方法均较好地平衡了数据：各协变量标准化偏差均控制在10%以内，大多数在3%以内。以核匹配为例（见表4），LR统计量由匹配前的211.86降至匹配后的9.87，解释变量联合显著性由1%水平显著变为高概率不显著；均值偏差和中位数偏差分别由匹配前的11.6%和8.2%降至2.6%和1.8%。图1显示，匹配后大多数变量的标准化偏差明显缩小，且均低于10%；图2倾向值共同取值范围显示，大多数观测值位于共同取值范围内，匹配仅损失少量样本。上述结果表明匹配后解释变量得到了较好平衡。

表4 匹配前后解释变量的平衡性检验结果

组别/匹配方法	LR统计量	*p*值	偏差均值	偏差中值
匹配前	211.86	0.000	11.6	8.2
匹配后	9.87	1.000	2.6	1.8

注：以核匹配为例进行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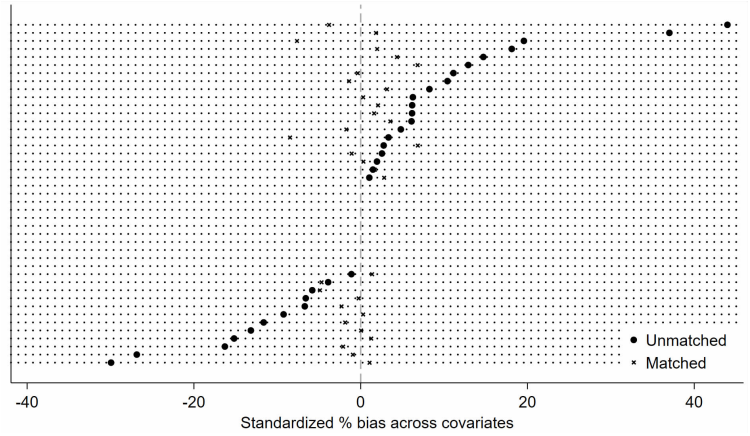


图1 各变量的标准化偏差图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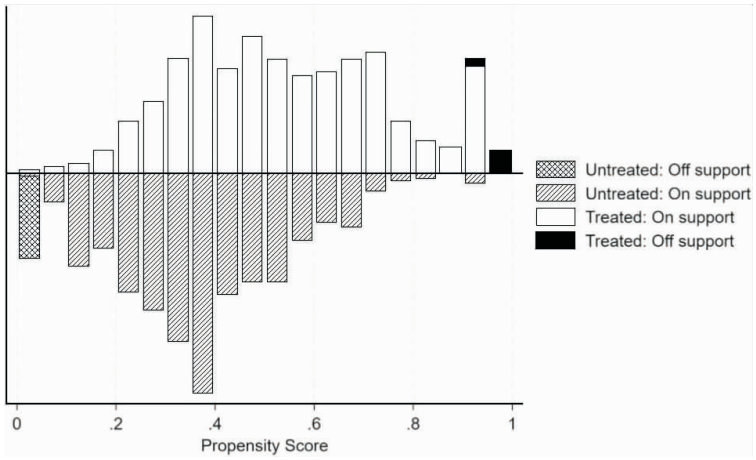


图2 倾向得分的共同取值范围

表5报告了倾向得分匹配前后处理组和控制组在各控制变量上的平衡性检验结果。其中，U表示匹配前样本，M表示匹配后样本。由表5可知，匹配前处理组和控制组在多个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经过倾向得分匹配后，处理组和控制组各变量均值差异明显缩小，且所有控制变

量 t 检验结果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p 值均大于 0.1,表明匹配后处理组和控制组在可观测特征上已经不存在显著差异,样本平衡性得到明显改善。

表 5　匹配前后控制变量的平衡性检验结果

变量	匹配状态	均值		t-test	
	(匹配前/后)	处理组	控制组	t	$p>t$
所在行政村离县城的距离	U	33.957	29.509	2.14	0.032
	M	32.196	29.846	1.22	0.224
慢性病人占家庭总人口的比重	U	0.146	0.184	-2.38	0.018
	M	0.146	0.143	0.21	0.836
家庭经营土地面积	U	3.626	3.392	2.87	0.004
	M	3.609	3.585	0.29	0.770
行政村人均收入	U	9.125	9.071	0.52	0.601
	M	9.131	9.266	-1.33	0.185
家庭过去一年自付医疗费用	U	7.280	7.082	1.75	0.081
	M	7.283	7.289	-0.06	0.953
参加医疗保险人数占家庭总人口的比重	U	0.932	0.919	0.97	0.333
	M	0.931	0.927	0.25	0.803
是否购买农业保险	U	0.323	0.166	5.96	0.000
	M	0.320	0.313	0.25	0.806
家族关系	U	3.726	3.645	1.65	0.100
	M	3.731	3.742	-0.21	0.832
受访者受教育年限	U	9.427	8.611	3.07	0.002
	M	9.384	9.703	-1.18	0.237
过去三年,家中是否有人失业	U	0.044	0.084	-2.54	0.011
	M	0.045	0.050	-0.36	0.718

3. 敏感性分析

倾向得分匹配(PSM)依赖条件独立性假设,能缓解可观测特征上的差异。但在现实中,农户就业积极性、信息获取能力等不可观测因素,可能同时影响其政策参与概率与最终收入水平,从而引发未观测变量的选择偏误。

为检验 PSM 估计结果对潜在隐性偏误的敏感程度,本文采用基于模拟的敏感性分析方法。其核心思路是:在匹配模型中模拟一个潜在二元混杂变量 U,并将其作为新协变量纳入倾向得分估计,重新评估帮扶政策的处理效应。若加入模拟混杂变量后,政策的平均处理效应仍然显著为正,则表明估计结果对一定程度的隐藏偏误具有稳健性。

具体而言,本文设定四个参数 P_{11}、P_{10}、P_{01}和 P_{00},用于描述潜在混杂变量 U 在不同处理状态和收入状态下出现的概率。其中,$T=1$ 表示农户参与就业帮扶,$T=0$ 表示农户未参与就业帮扶;由于收入变量为连续变量,本文按照收入中位数将其转换为二元变量,$Y=1$ 表示收入高于中位数,$Y=0$ 表示收入不高于中位数。因此,P_{ij}表示在 $T=i$、$Y=j$ 条件下潜在混杂变量 $U=1$ 的概率。需要说明的是,收入变量的二元转换仅用于模拟潜在混杂变量,ATT 仍然基于原始收入变量进行估计。本文设定四组由弱到强的隐藏偏误情境。随着 P_{11}、P_{10}、P_{01}和 P_{00}之间差异逐渐扩大,表示潜在混杂变量对就业帮扶参与和收入水平的影响逐步增强。表 6 报告了基于模拟的敏感性分析结果。

从表 6 可以看出,在引入模拟潜在混杂变量后,随着隐藏偏误情境逐步增强,模拟 ATT 分别为 0.811、0.787、0.766 和 0.737,均保持正向,且总体仍具有统计显著性。这一结果表明,即使存在一定程度的未观测混杂因素,就业帮扶政策对农户收入的正向影响并未发生方向性改变。

因此,本文基于倾向得分匹配得到的估计结果对一定程度的未观测选择偏误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表6 基于模拟的敏感性分析结果

隐藏偏误情境	参数设定(P_{11},P_{10},P_{01},P_{00})	ATT	标准误
情境一	0.42, 0.38, 0.36, 0.32	0.811**	0.384
情境二	0.46, 0.41, 0.38, 0.33	0.787**	0.381
情境三	0.50, 0.44, 0.39, 0.33	0.766**	0.386
情境四	0.54, 0.47, 0.40, 0.32	0.737*	0.387

注:由于核匹配运行时间过长,所以敏感性分析中采用了近邻匹配方法。情境一至情境四为逐步增强潜在隐藏偏误后的模拟结果。

(四)影响机制分析

采用两步回归方法检验影响机制,所有模型均加入全部控制变量,结果见表7。第(1)、(3)列结果显示,就业帮扶政策系数始终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政策参与程度越高,农户家庭非转移性收入越高。在劳动供给行为方面,第(2)列结果表明,就业帮扶政策显著提高家庭劳动参与率,参与度每提高一个单位,劳动参与率上升0.4%。在劳动供给能力方面,第(4)列结果显示,政策显著提高家庭技能劳动力占比,参与度每提高一个单位,占比上升0.5%。可见,就业帮扶政策通过行为激活与能力提升促进家庭增收:技能水平提升增强了农户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意愿与可行性,实际劳动参与扩大为技能资本的变现提供载体,二者共同作用推动农户收入可持续增长。

表7 就业帮扶政策赋能农户收入增长的机制分析

变量	家庭非转移性收入 (1)	家庭劳动参与率 (2)	家庭非转移性收入 (3)	家庭技能劳动力占比 (4)
就业帮扶政策参与度	0.047***(0.014)	0.004***(0.001)	0.047***(0.014)	0.005***(0.00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1.276(1.253)	0.021(0.104)	1.276(1.253)	0.495***(0.103)
R^2	0.36	0.17	0.36	0.42
N	1059	1059	1059	1059

注:*、**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为进一步检验机制的稳健性,参考尹洪英等[63]的分组回归逻辑:若政策X是通过机制M影响收入Y的,则在客观上有利于机制M发挥作用的群体中,政策效应必然更强(见表8)。对于劳动供给行为(家庭劳动参与率)机制而言,近郊村庄劳动力市场日渐完善,政策的边际作用有所递减;偏远村庄面临空间摩擦与信息不对称,政策更能有效弥补市场失灵。基于此,本文根据"村庄距县城距离"变量的样本均值(31.39),将样本划分为近距离、远距离两组。回归结果显示,远距离组的政策参与度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而近距离组则不显著。这一对比表明,就业帮扶政策在偏远地区表现出更强的增收效应,从而进一步印证了就业帮扶政策通过"提升农户劳动参与率"这一机制来促进增收。就劳动供给能力(家庭劳动技能)机制而言,低学历农户人力资本与技能短板显著,技能培训的边际改善作用更强。基于此,本文按照受教育年限将样本划分为低学历(高中以下)和高学历(高中及以上)两组。回归结果显示,低学历组的政策参与度系数为0.050(在5%水平下显著),高于高学历组的0.040(在5%水平下显著)。这表明,就业帮扶政策对低学历群体增收效应更强,即政策通过"提升农户技能水平"的途径来促进增收。

表 8　就业帮扶政策赋能农户收入增长的机制分析

变量	家庭非转移性收入			
	近距离	远距离	低学历	高学历
	（1）	（2）	（3）	（4）
就业帮扶政策参与度	−0.009（0.016）	0.160***（0.030）	0.050**（0.022）	0.040**（0.02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6.875***（1.221）	−5.688**（2.165）	−0.020（1.416）	2.918（1.918）
组间系数差异	0.170***		0.010	
（p 值）	（0.000）		（0.715）	
R^2	0.29	0.45	0.39	0.22
N	562	497	716	343

注：***、**和*分别表示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组间系数检验基于似无相关模型的检验方法（suest）。

（五）调节效应分析

表 9 分组回归结果显示就业帮扶政策效果存在群体异质性。贫困程度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建档立卡户的政策参与度每提升 1 个单位，非转移性收入显著增长 21.1%，远高于非建档立卡户的 2.9%，表明政策对贫困家庭具有较强的“雪中送炭”效能，能有效激活增收潜力。社会资本的调节效应呈逆向分化：低社会资本家庭政策边际增收效应为 5.5%，高社会资本家庭仅为 1.9% 且不显著。这一发现与理论假说（H4）相悖：为何社会资本水平越高，就业帮扶政策的收入效应反而越低？针对这一现象，本文从宏观空间结构错位与微观资源依赖及替代效应的双重机制出发给出学理阐释。

表 9　就业帮扶政策赋能农户收入增长的异质性分析

变量	家庭非转移性收入			
	建档立卡户	非建档立卡户	高社会资本户	低社会资本户
	（1）	（2）	（3）	（4）
就业帮扶政策参与度	0.211***（0.047）	0.029**（0.013）	0.019（0.014）	0.055**（0.02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3.242（3.814）	6.408***（1.018）	8.738***（1.097）	0.414（1.783）
组间系数差异	0.182***		0.036	
（p 值）	0.000		0.178	
R^2	0.46	0.31	0.21	0.43
N	318	741	552	507

注：***、**和*分别表示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组间系数检验基于似无相关模型的检验方法（suest）。

一方面，就业帮扶政策供给存在空间与市场层级错位。高社会资本农户的生计网络跨越乡土边界，深度嵌入更广阔的劳动力市场，所需就业资源具有外部性与专业性[64]。而现行政策资源多集中于县镇两级，呈现出属地化兜底的特征[65]，跨域需求与本地供给错配，社会资本难以转化为增收效能。反之，低社会资本农户高度受限于本地市场，与政策供给精准互嵌，边际增收效应更强。

另一方面，微观层面存在着资源依赖与替代效应。依据资源依赖理论，农户对政策的依赖强度由其内部社会资本决定[66]。高社会资本农户凭借广泛的社会网络与强关系纽带低成本获取优质就业信息与资源[67]，内部资源自给能力在功能上替代了政府的正式支持；低社会资本农户社交网络封闭，难以依靠非正式网络化解就业困境，必须高度依附外部政策资源，因而政策响应度更高。总体上，社会资本水平重塑了农户对就业帮扶政策的依赖格局。

(六)不同类型的就业帮扶政策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表10显示,异质性政策工具的增收效果存在差异。控制个人及家庭等特征后,技能提升类政策参与度每提升1个单位,家庭非转移性收入增长14.3%;创业与合作支持类政策参与度每提升1个单位,则增长4.3%。可见,技能提升类政策的增收效应更为突出。这表明人力资本是家庭增收的关键因素,提升劳动力技能和知识储备能增强其劳动市场的适应性与竞争力,从而获取更高报酬的岗位或创造更高附加值的经营活动。创业与合作支持类政策虽具增收潜力,但受初期投资大、风险高、回报周期长等因素制约,边际增收效应相对较低。

表10 不同就业帮扶政策赋能农户家庭非转移性收入增长的差异化分析

变量	(1)	(2)	(3)	(4)
技能提升类政策参与度	0.135***(0.027)	0.143***(0.030)		
创业与合作支持类政策参与度			0.131***(0.021)	0.043*(0.023)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城市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是
常数项	9.256***(0.213)	1.200(1.255)	9.143***(0.205)	1.374(1.248)
Pseudo R^2	0.01	0.37	0.02	0.36
N	1059	1059	1059	1059

注:***、**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五、结论与讨论

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推进共同富裕的背景下,探究就业帮扶政策的增收效应及作用机制,对于优化公共政策设计、激发农户内生动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20年"农村居民家庭生计状况与减贫政策"微观调查数据,系统评估了就业帮扶政策对农户非转移性收入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第一,就业帮扶政策对农户非转移性收入具有显著正向提升作用。其中,技能提升类政策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较创业与合作支持类政策展现出更高的可持续性与收入转化率。第二,就业帮扶政策的增收逻辑在于"能力"与"行为"双重驱动。机制检验表明,政策通过提高家庭劳动供给能力、促进家庭劳动供给行为,重塑微观主体内生造血动能,进而提升收入水平。第三,政策红利在不同群体间呈结构性分化。异质性分析揭示,就业帮扶政策对建档立卡户及低社会资本农户的增收效应更为突出;高社会资本群体因其内部资源自给能力较强、跨域发展需求较高,对属地化、基础性公共干预产生明显挤出效应,侧面印证了当前政策供给与高阶市场需求之间存在空间错配。

基于上述发现,为进一步破解农村结构性就业矛盾、提升政策资源配置效率,本文提出以下优化路径:第一,强化数字赋能,构建"主动识别-动态预警"的精准瞄准机制。打破部门数据孤岛,建立涵盖技能水平、就业状态与社会资本特征的多维数据库,推动政策响应从"被动申请"向"主动匹配"转变,设置失业风险与收入下滑预警指标,实现对脆弱群体的精准捕捉与前置干预;第二,优化工具组合,实施基于资源禀赋的差异化分层供给。确立技能提升类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分类施策:对低社会资本与建档立卡户,聚焦基础技能与心理赋能的融合培训,推广普惠信贷并鼓励参加本地合作社;对高社会资本农户,要突破属地化限制,提供跨域市场对接、创新创业孵化等服务,带动乡村产业发展;第三,重塑协同生态,打造"监测-评估-反馈"的政策闭环。建立农户需求诊断系统,推动就业帮扶与产业规划、金融下乡深度绑定。引入政策效能动态评估机制,依据市场反馈动态调整政策,推动就业帮扶由"短期输血"向"全生命周期赋能"转变。

本文仍存在一定的拓展空间:首先,受限于截面数据,本文难以捕捉政策红利释放的动态演变轨迹,未来可依托面板数据进行长效因果推断。其次,机制测度尚未深入解构技能内部的层级分

布（如高技能与中低技能的差异化回报），若能引入精细化的职业代码与技能加权指数，将深化对劳动力质量机制的认知。最后，政策维度内部的具体工具可能存在效能异质性，后续可开展更微观的政策工具比较研究。

参考文献：

[1]方长春. 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内涵、意义与路径[J]. 人民论坛，2024(12)：24－27.

[2]冈特·施密德，杰奎琳·奥赖利，克劳斯·朔曼，等. 劳动力市场政策评估国际手册[M]. 杨伟国，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3]杨灿明，万欣. 增进民生福祉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J]. 财政研究，2024(8)：21－33.

[4]Card D，Kluve J，Weber A. Active labour market policy evaluations：a meta-analysis[J]. The Economic Journal，2010(548)：F452－F477.

[5]Bharti N. The role of training in reducing poverty：the case of micro enterprise development in Indi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2014(4)：291－296.

[6]罗楚亮，刘盼. 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匹配效率及其地区差异[J]. 管理世界，2022(7)：133－147.

[7]李晓曼，白诗佳，陈玉杰. 我国职业技能培训补贴策略与高质量就业——来自“培训单位—劳动者”匹配数据的证据[J]. 经济科学，2023(1)：203－220.

[8]Hujer R，Blien U，Caliendo M，et al. Macro econometric evaluation of active labour market policies in Germany[M]//The European Labour Market. Heidelberg：Physica-Verlag HD，2006.

[9]周世军，刘丽萍，卞家涛. 职业培训增加农民工收入了吗？——来自皖籍农民工访谈调查证据[J]. 教育与经济. 2016(1)：20－26.

[10]徐金海，蒋乃华，胡其琛. 新型农民培训工程实施绩效评估研究——基于江苏省的实证[J]. 农业经济问题，2014(10)：46－54.

[11]黄承伟. 贫困程度动态监测模型与方法[J]. 广西社会科学，2001(1)：62－63.

[12]Sen A. Development as freedom[M].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13]Ramos C R，Ng M C M，Sung J，et al. Wages and skill utilization：the impact of broad and general skills on the wages of singapor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2013(2)：116－134.

[14]翟世贤，彭超. 培训能增加农民收入吗——基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的实证研究[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108－121.

[15]Abro Z A，Alemu B A，Hanjra M A，et al. Policies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growth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rural Ethiopia[J]. World Development，2014，59：461－474.

[16]平卫英，罗良清，张波. 我国就业扶贫的现实基础、理论逻辑与实践经验[J]. 管理世界，2021(7)：32－43.

[17]尹义坤，宋长兴，齐秀琳. 职业技能培训与农民就业质量——来自 CRRS 的经验证据[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3(4)：79－91.

[18]Li F，Liu D C，Gao P，et al. Analysing how government-provided vocational skills training affects migrant workers' income：a study based on the Livelihood Capital Theory[J].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mmunications，2024(1)：396.

[19]Imai K S，Gaiha R，Thapa G. Does non-farm sector employment reduce rural poverty and vulnerability? Evidence from Vietnam and India[J].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2015(36)：47－61.

[20]刘璐婵. 公共就业服务能促进个体劳动参与吗？——来自 CLDS 的证据[J]. 南方人口，2022(5)：38－53.

[21]张鹏龙，钟建乐，胡羽珊. 防止返贫帮扶政策效果评估——基于劳动收入的视角[J]. 管理世界，2024(3)：127－152.

[22]Green F，Hoskins M，Montgomery S. The effects of company training，further education and the youth training scheme on the earnings of young employees[J].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96(58)：469－488.

[2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的通知. [EB/OL]. (2021－08－27) [2026－03－20]. 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1－08/27/content_5633714.htm.

[2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关于切实加强就业帮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EB/OL]. (2021－05－04) [2026－03－20]. 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1/content_

5616174.htm.
[25]平川区乡村振兴局.什么是就业帮扶工作?[EB/OL].(2023-01-18)[2026-03-20].https://www.bypc.gov.cn/zfxxgk/bmdwxzjd/bmdw/xczxj/fdzdgknr/zczxwdk/art/2023/art_d4374b5c9d3c4164bf00fdaa2454655c.html.
[26]九江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九江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关于印发2025年中央财政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培育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EB/OL].(2025-05-20)[2026-03-20].https://www.chaisang.gov.cn/zwgk/zfxxgk/fdzdgknr/zdlyxx/shgysy/snbt/202509/t20250908_7009016.html.
[27]张丽宾.促进城乡一体化与减贫的就业政策[J].当代经济管理,2014(4):44-53.
[28]蔡小慎,王雪岚,王淑君.可持续生计视角下我国就业扶贫模式及接续推进乡村振兴对策[J].学习与实践,2021(5):30-41.
[29]吐尔地·卡尤木,阿依古力·阿布力孜.县域城镇化、绿洲农业工业化与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调查研究——以阿克苏地区B乡为例[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6):66-71.
[30]陈飞,李玲.农民合作社发展的增收效应:基于村庄内部溢出作用的视角[J].财经研究,2025(8):36-50.
[31]冯兰兰,卓成刚,袁翠莲.数字乡村与农村劳动力高质量就业——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J].资源开发与市场,2026(3):383-392.
[32]Piore M J.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to what paradigm does it belong[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3(2): 249-253.
[33]赵燕菁.大崛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437.
[34]贺括,郭一达,蒋仁爱.政府投资基金如何赋能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1):1-13.
[35]高海.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专业合作社融合发展——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例[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5):75-85.
[36]Vaizey J, Schultz T W.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J]. The Economic Journal, 1972(326):787-788.
[37]邹小勤,何佩遥.数字经济背景下农村三产融合新业态的富民效应与机制研究——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4):279-294.
[38]张乐,李瑾.数字经济时代劳动关系的互构共变机制——基于控制与自主的交互视角[J].人文杂志,2024(3):120-129.
[39]袁志刚,方颖.劳动供给理论的新发展及其在中国的应用[J].经济研究,2005(6):107-116.
[40]孟维福,侯恒宇,吴琦.输血还是造血:特色农业政策能否提升农村居民内生发展能力[J].财经问题研究,2025(10):91-104.
[41]鄢姣,许敏波,尹训东.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双重市场均衡与扩张[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23(5):38-53.
[42]王雪,王晶.何去何从:性别视角下养老护理员的职业流动[J].妇女研究论丛,2025(2):17-33.
[43]惠献波.农村劳动力非农劳动参与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河南省728户的调查数据[J].南方农业学报,2013(3):530-534.
[44]付琼,马澜芯,胡江林.社会资本对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J].经济纵横,2022(7):118-128.
[45]宋文飞,韩先锋.生态保护边界、社会资本与贫困县农村收入差异[J].财经科学,2020(3):107-119.
[46]潘岚,张露,万浩然.社会规范脱序、社会网络嵌入与社会信任重塑:数字经济发展如何打破农民工"同乡同业"格局[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5):73-89.
[47]张雪,郭伟和.民族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精英行动策略研究[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3):69-77.
[48]陈晓东,严丽,梁良,等.增能视角下农村建档立卡户可持续脱贫能力提升的路径探究——以辽宁省F市为例[J].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2(3):8-16.
[49]彭刚,孙琳,代盈,等.互联网使用增强了低收入群体的家庭经济韧性吗[J].财经科学,2025(8):107-122.
[50]向蓉.非认知能力对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影响与差异:基于元分析的证据[J].教育与经济,2025(3):59-66.
[51]范征,杨欣.自主性、胜任感、归属感:乡村CEO的心理需要满足——基于留守妇女的实证研究[J].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29-38.
[52]蒋炜,杨阳,徐舒,等.就业帮扶的增收效应考察——来自2015—2023年全国125个脱贫县追踪调查数据的证据[J].中国农村观察,2025(6):3-22.
[53]Ellis F. Household strategies and rural livelihood diversification[J].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1998(1):

1 – 38.
[54]夏柱智,贺雪峰. 半工半耕与中国渐进城镇化模式[J]. 中国社会科学,2017(12):117 – 137.
[55]黄宗智,彭玉生. 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与中国小规模农业的前景[J]. 中国社会科学,2007(4):74 – 88.
[56]孙小宇,杨钢桥. 农业社会化服务对耕地撂荒的抑制效应——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J]. 资源科学,2024(8):1554 – 1569.
[57]宋洪远,武继强.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国别实践及其经验启示[J]. 世界农业,2025(6):5 – 14.
[58]周广肃,樊纲,申广军. 收入差距、社会资本与健康水平——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实证分析[J]. 管理世界,2014(7):12 – 21.
[59]赵昕,蒋文莉. 社会资本对就业中过度教育匹配的影响及其机制——来自 CFPS2018 的证据[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1):77 – 86.
[60]江艇. 因果推断经验研究中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J]. 中国工业经济,2022(5):100 – 120.
[61]赵健宇,陆正飞. 养老保险缴费比例会影响企业生产效率吗?[J]. 经济研究,2018(10):97 – 112.
[62]余靖雯,麦东仁,龚六堂. 社会养老保险、家庭隔代抚养与老年人健康[J]. 经济学(季刊),2023(1):108 – 124.
[63]尹洪英,李闯. 智能制造赋能企业创新了吗? ——基于中国智能制造试点项目的准自然试验[J]. 金融研究,2022(10):98 – 116.
[64]谢家智,王文涛. 社会结构变迁、社会资本转换与农户收入差距[J]. 中国软科学,2016(10):20 – 36.
[65]许汉泽.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欠发达地区就业政策精细化——基于劳动力类型的分析[J]. 贵州社会科学,2023(1):161 – 168.
[66]沈费伟,袁梅. 乡村青年数字弱势群体权益保障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基于资源依赖理论的考察[J]. 人口与社会,2025(1):23 – 34.
[67]郭云南,姚洋. 宗族网络与农村劳动力流动[J]. 管理世界,2013(3):69 – 81.

The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Employment Support Policies Empowering Farmers′ Income Growth

YANG Yu-xuan, HUANG Si-lin, ZHANG Kai-yun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42, *China*)

Abstract: The increase of farmers′ income is an important connotation of advancing common prosperity and realizing the people′s aspiration for a better life. However, there still exists academic debate on the income effect of employment support policies. Accordingl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mpact of employment support policies on farmers′ non-transfer income using the 2020 survey data of rural households′ livelihood status and poverty reduction policies. The findings show that employment support policies have a positive promotion effect on farmers′ non-transfer income, and its influence mechanism lies in that employment support policie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household labor supply capacity and promote household labor supply behavior. Heterogeneity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employment support policies on the non-transfer income of registered poor households and households with low social capital level is more prominent. This study enriches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income-increasing effect of employment support policies empowering farmers, deepens the exploration on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policy-driven income growth, and provides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optimizing the targeted implementation direction of employment support policies, consolidating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advancing common prosperity.

Key Words: employment support policies; farmers′ income; non-transfer income; household labor supply; common prosperity

【责任编辑:杜晓艺】